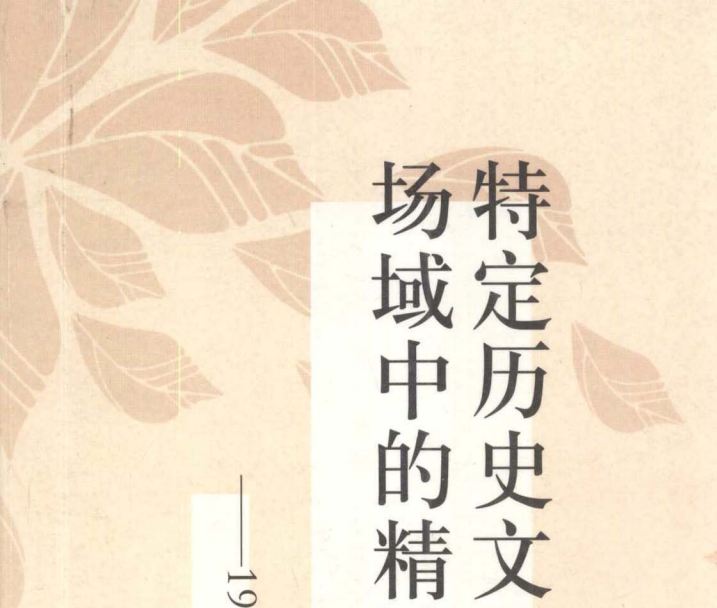




特定历史文化 场域中的精神诉求

王璐◎著

——19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研究

时代文艺出版社

特定历史文化 场域中的精神诉求

王璐◎著

——19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

(编号: 11YJA751070)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特定历史文化场域中的精神诉求：19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研究 / 王璐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7

ISBN 978-7-5387-4781-2

I. ①特… II. ①王… III. ①妇女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2712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陈秋旭

装帧设计 陈阳

排版制作 隋淑凤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违者必究

特定历史文化场域中的精神诉求

——19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研究

王璐 著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长春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1000mm 1/16 字数 / 300千字 印张 / 20.5

版次 / 2015年7月第1版 印次 /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30.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序

李新宇

这是王璐女士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是1990年代中国大陆的女性文学。

女性文学研究在中国是个比较年轻的课题，因为女性文学本身也还没有多少年岁。虽然这片土地上很早就有女性作家，但她们的创作却与男性的创作差别不大，按照当下学界的一般认识，就还算不上真正的女性文学。五四时期有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并在文学创作中有所体现，可惜五四精神持续时间太短，很快就随着社会思潮的转向和文化传统的复归而式微，在“个人”和“人”都受到围堵拦截的时代，女性的解放与权利诉求就谈不到了。进入1950年代之后，“妇女解放”的口号一直喊得很响，女性的地位也似乎很高，甚至被称作“半边天”，但伟大领袖的话却也透露了其中奥秘：“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做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做到。”于是，柔弱的女孩子必须经受千锤百炼，变成“铁姑娘”，去从事那些历来都由男人承担的繁重体力劳动。如此意义上的“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当然不是女性的福音。总之，从40年代到50年代，“妇女解放”的宣传主要在于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去破坏一个旧世界，50年代到70年代，这种宣传的主要功能就在于动员更多的劳动力以填补新时代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带来的经济空洞。在这个背景下，女人和男人都趋于无性化，人情、人性、人道主义都是被批判和驱赶的对象，文学没有人性的位置，自然容不得女性意识，也就不会有女性文学。

直到进入80年代，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你将格外不幸，因为你是女人。”当张洁在她的中篇小说《方舟》卷首写下这句话时，意味着女作家

的性别意识已经醒来，开始获得自己的立场。回顾那个年代，张洁、张抗抗、张辛欣、陆星儿等一批作家对女性在社会、家庭、婚姻、事业中的生存困境而进行的一系列表现，引发了许多争论，也使女性的生存和命运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在这一点上，她们功不可没。然而，这一时期关于女性的书写是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潮流中随着对历史的控诉和对人情、人性、人道的呼唤而展开的，是文学回归“人的文学”的一部分。所以，女性作家并未完全摆脱男性话语的覆盖，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自然不甚彻底。飞跃性的发展是在90年代中期。这本是一个文学精神急剧萎缩的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80年代文学那股狂飙突进的势头平息，理想、激情和浪漫精神也随之大面积熄灭。然而，当作家们在无路之处寻找出路之际，却像发现芸芸人生的日常生活尚可描写一样，女性的内心世界和生命奥秘也被发现了。关注八方风云，自然难避风雨，穿衣镜里探讨身体和生命奥秘，却可以不涉政治敏感区域，于是就成了许多人的选择。加之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书生解放的口号响了起来，女性主义得以广泛传播，女作家的地位也迅速得到了提升。一时之间，“她们”“红罂粟”“红辣椒”等女作家丛书纷纷出版，女性文学似乎借此而扬眉吐气，出现了某些繁荣景象。

论及女性文学的研究价值，大概无须多说。道理很简单，在人类群体的生存和发展中，有些差别和矛盾大概是不容易消除的。而最难消除的差别和矛盾，大概要属性别、种族和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可以带来阶级翻身和解放的要求，民族意识可以带来民族解放和独立的运动，性别意识的觉醒自然要带来女性解放和权利的要求。而且，在这三大差别和矛盾中，性别之间的差别和矛盾也许更为长久。因为相比之下，人的阶级地位是比较好改变的，种族矛盾随着制度的完善和观念的改变，冲突也不会总是那么激烈。这是政治文明先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证明的。然而，无论置身于什么样的社会，一个女人都很难像一个无产者通过努力而变成有产者那样改变自己的性别身份。上帝所赋予的某些无法改变的东西，决定了差别和矛盾难以消除。既然如此，就像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阶层的人们

有不同的生活感受一样，女性作家面对自身的处境而进行的表现和思考，对一些问题的探讨，当然不应被忽略。总结和研究它，应该是学者的使命。

王璐的这本书所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在这里，作者梳理了女性文学发生、发展的历程，再现了1990年代女性文学繁盛的景观，而且探讨了它的成因，总结了女性文学对传统的突破和否定，对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作者对“弑父情结”“性政治”等一系列问题的论述，显示着她的个性，行文中不乏独到见解，而且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更值得称道的是，在她的论题之中，即使是那些并未充分展开的话题，也常常不乏启示意义。比如，她考察“弑父”和“恋母”情结，认定它产生于父权文化对女性的伤害，而且“恋父情结”和“弑母情结”也是同样的。再比如，她有这样一系列追问：女性觉醒之后是否走出了男权传统的樊篱？父权文化在歧视和压制女性的同时是否也伤害了男人自身？女性的性主体意识在物欲交换的过程中是确立了还是丧失了？打破贞操观念是一种解放，但弃绝贞操观念是否就意味着从传统观念中解放了出来？传统话语中的“淑女”“妓女”“荡妇”等形象，在1990年代的女性写作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变化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无论回答得怎样，都会帮助我们思考。

在90年代活跃的女性作家中，王璐似乎对张洁和陈染等情有独钟，对其作品读得很细，理解也透，所以多有独到之处。当下大陆流行一种不良的学风，从研究生到教授们，都学会了东拼西凑炮制论文，以规范的形式说一些毫无意义的话，既无风险又能完成学术指标。国家为了所谓学术繁荣的景观，个人为了经费和津贴的实利，学术生产很像1958年粮食和钢铁的大跃进。结果自然也相似，成果堆积如山，却无多少价值。我很高兴王璐能够不受这种时风的影响，没有学会根据限定的空间“放卫星”的那些技巧。她认真面对研究对象，一篇篇读她们的作品，写出自己的感受和体会。无论她对作品的把握是否准确，也无论理解是否深入到位，只要是带着自己的人生感受读出来的东西，就比那些东拼西凑、人云亦云的东西强得多。

本书的一些见解是值得称道的。比如，面对90年代女性写作的一些现

象，作者敏锐地发现了它的误区，并且指出它给女性主义文学带来的尴尬。当女性写作展示女性生命以反抗压抑与禁锢时，却不可避免地陷入被观看的境地，满足了男人的某种窥视欲，并由此引发了对“私人叙事”“身体写作”的商业炒作。由于商业炒作和个人利益的驱使，女性文学创作就出现了复杂的局面，一些人开始利用男性读者的窥视欲而炒卖自己，使女性文学走向堕落。王璐对此似乎有点痛心疾首。所以，她对张洁、陈染等人的写作给予高度评价，而对后来的“新新人类”和所谓“美女作家”就不那么客气。因为在她看来，那些作家并无严肃地追求和探索，而只是迎合市场的需要炒卖自己，这与出卖裸体照没有多少差别。王璐并不因此而抹杀她们的全部意义，她所不满于美女作家的，只是在喧嚣之后呈现出的虚无末路，以及它所导致的后果：她们以自己的喧哗遮蔽了前辈作家的严肃努力，使女性文学好不容易挣得的那片蓝天布满了阴霾，使原本对女性文学摇头的人更加振振有辞。王璐曾有这样一个比喻：在这个舞台上，本来是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穿着灰色的男式制服，90年代的女性写作正在把女人身上的男式制服脱去，换上鲜艳而合体的现代时装，把女性应有的特征还给女性，然而，这时所谓“美女作家”出现了，她们不仅不要外衣，而且索性一丝不挂，展开了裸体大比拼。这自然吸引了更多的观众，却干扰了人们对严肃探索的关注。应该说，王璐的担忧是可贵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面对女性文学，大陆研究界与创作界一样，大多只谈女性而不谈女权，无论作家还是学者，都很少涉及政治权利层面。可是，女性解放如果只是把反抗的对象锁定在男性，尤其是自己家中或身边的男性，其意义就可能大打折扣，结果可能是与自己所反抗的那一半一样难以获得解放。女性解放也罢，权利诉求也罢，都应该考虑不同的现实处境。在人的基本权利已经不成问题的地方，在女人所受的压迫已经不来自国家体制的地方，这反抗和斗争也许可以在厨房里或床上完成，但在人的基本权利尚需艰难争取的地方，女性为了自身的利益，却不能忽视与男性一起争取人的基本权利。

绪论 / 001

第一章 历史的孕育与时代的契机 / 040

第一节 中国女性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回顾 / 040

第二节 1990 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繁荣的原因 / 045

第三节 女性主义与传统文化 / 051

第二章 父权文化下生存困境的书写 / 059

第一节 对男性权力的消解 / 060

第二节 父权阴影下的女性成长 / 072

第三节 迷失的女性之真我 / 084

第四节 书写女性 / 母亲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 095

第五节 “俄狄浦斯情结” / 106

第六节 男人 / 父亲：同样是父权文化的受害者 / 117

第三章 性态度与性观念 / 123

第一节 贞操观念的困境 / 125

第二节 弃绝贞操观念的意识与困境 / 132

第三节 性叙事的观念形态 / 140

第四节 拒绝当“妓女”与想当“妓女”/153

第五节 “淑女”与“荡妇”/166

第六节 “纯粹的快乐”：性爱分离中的欲望书写/177

第四章 爱情：空白之页/188

第一节 男人：现代社会中的“单面人”/189

第二节 爱情：男人的欲望之城/198

第三节 爱情：女人的心灵之狱/208

第四节 谁为爱情埋单/222

第五节 物欲交换行为究竟能走多远/240

第六节 心灵挚爱的执着书写/253

第五章 “累斯宾”文学情结与超性别意识/260

第一节 “累斯宾”：人性的书写/262

第二节 “累斯宾”文学情结与男权文化/275

第三节 超性别意识与双性同体/284

结语/298

参考文献/302

论文/302

著作/311

绪 论

—

在世界范围内，人的解放、自由和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共同的追求。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①，也就是人的丰富、复杂本性的全面实现。但是，人类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已严重地束缚并影响了人的全面发展；而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又受到了过多的歧视、压制与禁锢。因此，女性解放成为人类解放的一部分，女性文学也承载着人的解放和女性解放的精神和梦想。而相对于以往的文学创作，19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对那些束缚并禁锢人自由发展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进行了大胆的突破与越界，体现出鲜明的解放意识。因此，对1990年代女性文学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解读无疑对促进人的解放和女性解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推动作用。

但是，跨世纪的“美女文学”现象把女性文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也导致了随之而来的沉寂，使女性文学研究也遭到了冷遇。

女性文学因对人类道德操守的冲击而似乎成了洪水猛兽，使那些原本对女性文学持偏见的人更加有了鞭挞的理由，那些曾热衷关注者似乎也产

^① 转引自邴正等著：《科学发展观概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2页。

生了厌倦和遗弃。而女性文学的研究者也似乎被认为是在一个过时的领域里从事着毫无价值的工作，常常要遭遇一些貌似肯定却又盛满了无奈的理解和同情的眼光。更有甚者，那些对女性文学不曾阅读和研究的人，却也装出一副对女性文学厌倦和遗弃的样子，有的甚至更为滑稽地将与女性文学研究者划清界限来证明自己的正统、高洁和严肃——也就是说，女性文学研究者似乎也跟女性文学一样有了道德和操守上的问题。

女性文学及其研究所面临的困境说明：尽管文坛曾一片热闹，评论之声众说纷纭，但人们对女性文学精神及其创作品格仍缺乏足够的了解和重视。身为女性，因为受女性文学的影响而开始思考女性问题、人的问题、传统思想与现代性人格相冲突的问题以及人的解放和女性的解放等问题，我觉得有责任对女性文学的创作精神和品格，以及女性文学中所蕴涵的现代性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解读，以将女性文学创作的真正面貌更好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从而在人性的本质上共同促进女性的解放、人的解放和现代性的发展。

给女性文学及其研究带来非议的主要是 1990 年代以来立足于女性立场的写作，尤其是那些被命名为“个人化”“私人化”“躯体写作”等的创作。所以本文将以 1990 年代的女性文学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进行研究和阐释，挖掘其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精神取向和价值选择以及现代性的转变。

人们对 1990 年代女性文学中的“个人化”“私人化”“躯体写作”等创作产生的异议、争论和否定最多，因为它充分体现了女性文学对传统文化的叛逆、颠覆和否定。因此，相对于以往的文学，有人认为，“纵观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致命的缺陷表现为：只谈个人问题，不谈公共问题；只谈家中、卧室内、浴缸里，不谈社会、广场；只谈形而上，宇宙的人生困惑，生存的永恒的痛苦烦恼、生命哲学、弗洛伊德、尼采、叔本华，不谈具体的社会压迫问题、不谈与自己无关的他人的眼泪。总之，只谈最形而下和最形而上的两头，不谈作为社会性的中间。在这个前提下，女性主义作品虽然把男性写得非常丑陋、卑鄙，可以一千次一万次地诅咒男权文化，

却损伤不了男权文化半点皮毛。”^①

也有人认为,“她们无视社会的要求和人类崇高精神,无望地描写自己的幻想,将生活的场景铺叙为肉欲的满足,在可望不可及的情爱中自戕着人类心目中的崇高,精神上的彻底毁灭,物质上的望梅止渴,使她们不得不重新捡拾起自我情感的象征和肉欲的张狂,表现着情节上的极度迷乱和嚣张。女性的个性情感完全淹没了理性,其形象的跛足,在人的生存空间中留下了无法接纳的空白。”^②

“性与爱、灵与肉、情与欲之间已没有了任何纠缠,爱情的意义已被彻底掏空,留下的只有性——一种带有原始状态的性技术性操作的演示,性的娱乐只能被升华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消解了人类赖以支撑自我诗性生活的爱情理想,而且也违背了作为社会群体的人应有的伦理操守和羞耻之心。”^③

以上只是从众多否定的声音中撷取的样本。文学批评当然可以站在各种角度和立场上进行批评,但是,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作家自己的创作立场和文化姿态。如果忽视这一创作的根本出发点,那么批评的结果就不可避免地陷入误读甚至是歪曲。王彬彬认为:“比较严格意义上的女性文学,应当有一个独立的判断标准和尺度。我们以什么样的尺度来评价女性的写作,如果按照常规审美观点,那女权主义者是不承认那个尺度对她们是有效的。我们解读文学的审美价值尺度,是历史形成的,是文学史的构成部分。而女权主义者说,这是男权中心的产物,是男权审美价值尺度,它会造成对女性文学的偏见乃至歧视,因此她们要重新确立她们的标准。这种矛盾的结果,正如西方女权主义盛行时,一些批评家指出的那样:以女性地位确立批评准则影响了文艺批评的真正价值和常规价值。”^④

① 禹建湘:《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面临的困境》,《湖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第109页。

② 楼益龄:《关于女性批评的批评》,《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5期,第42页。

③ 转引自愚士选编:《以笔为旗——世纪末文化审判》,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39页。

④ 丁帆、王彬彬、费振钟:《“女权”写作中的文化悖论》,《文艺争鸣》1997年第5期,第13页。

上述批评的结果不能排除批评者没有真正认识和理解女性写作的主旨，而产生这种隔阂的原因无疑源于批评的标准和立场。

首先，不能用以往的文学标准来衡量 1990 年代的女性文学创作。1990 年代以前，在左翼文学传统影响下的中国文学，追求社会中心价值，注重社会题材、重大主题、宏大叙述、史诗性追求、甚至是革命立场，而个人的、私人的、一己的往往被认为是价值很小的、无意义的、视野偏激或狭小的。而到了 199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确立，个性的张扬、艺术的多元化追求，个人的价值以及对个人空间的书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流行和推崇，而实际上是“参与了解构原有意识形态，建构新的意识形态的进程。”^①于是，原有的文学评价标准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作家的创作个性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陈染认为，“在人性的层面上，恰恰是这种公共的人才是被压制了个人特性的人，因而她才是残缺的、不完整的、局限的。”^②至于题材的“大”与“小”，她进一步指出，“个人化不等于‘小’，群体化不等于‘大’”，“缺乏个人化的文化是‘贫穷的文化’”，“没有个人色彩的文化、缺乏独特的个体思想的艺术，则是‘贫穷文化’的特征。动辄以‘国家’、‘人民’的幌子强行抑制个人的声音（此处仅指艺术），武断地以‘主流群体’的名义覆盖个人的意识（此处仅指学术），应该说是精神的文明仍处于蒙昧不开的社会阶段的行为。现代世界几乎所有的哲学家，从康德、维特根斯坦到克尔凯格尔，无一例外地大谈个人的重要性，个人是人类的基本单位，精神的个人化的程度从某一侧面可以看做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③林白在谈到自己创作时也曾说过：“个人写作建立在个人体验与个人记忆的基础上，通过个人化的写作，将包括被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人性经历从受到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我看到它们来回飞翔，

① 邵燕君：《“美女文学现象”研究——从“70后”到“80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7 月第 1 版，第 5 页。

② 陈染：《不可言说》，作家出版社 2000 年 5 月版，第 181 页。

③ 陈染：《声声断断》，作家出版社 2000 年 5 月版，第 100 页。

它们的身影在民族、国家、政治的集体话语中显得边缘而陌生，正是这种陌生确立了它的独特性。”“个人化写作是一种真正生命的涌动，是个人的感性、智性、记忆与想象、心灵与身体的飞翔与跳跃，在这种飞翔中真正的、本质的人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①因此，面对1990年代的个人化、私人化的女性写作，再谈个人与集体的，私人与公共的价值和意义显然已很不确切。

其次，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认识和理解。对于“身体”和“性”的书写对女性主义来说，是写作的目的也是手段。在男权话语主宰的历史和文化中，女性没有自己的语言，因此女性只有靠“身体”和“性”寻找和建立女性自己认知世界的思维和方法。对此丁帆认为，“‘性’在女权小说中，不是作为别的而是作为一种女性生存姿态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存在姿态，正是一种反压迫的姿态。”^②“‘性’作为中国女性作家写作的重要突破口，主要的叙事主题就是反抗性历史压迫。在文学话语中没有别的方式，只有性话语才能颠覆男性叙事中心，最终颠覆历史。”^③可见，性在女性写作中是为了揭示被历史和文化压抑和遮蔽的女性的生命存在，也是女性用以颠覆男性权力的手段，它体现的是作家的一种叙事姿态和文化立场，这跟个人的道德品质没有关系。

再次，对于人的肉体和精神的认识。传统文化过分地强调了人的精神追求而压制了人的肉体欲望。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学一度为“性”正名，到了1990年代，性作为人的合法的生理需要已经得到了文学、艺术、生活等各个领域的全面肯定和尊重，对性需求的表达不再是一种羞耻和罪恶，女性的性表达当然也应该受到同等的尊重和肯定。只是一直以来人们都习惯了男人对性的书写和表达，而女人一旦书写就变成伤风败俗、违背道德伦理的了。原因不过在于“一个男性中心遗毒深厚的社会环境里，女性的

① 林白：《记忆与个人化写作》，《作家》1997年第7期，第14页。

② 丁帆、王彬彬、费振钟：《“女权”写作中的文化悖论》，《文艺争鸣》1997年第5期，第14页。

③ 同上，第15页。

经验,尤其是身心的感受,要么被遮蔽,被隐抑,要么成为被看和欲望的对象,这几乎是无可避免的。”^①所以当女性在突破这种传统时,往往被认为是女性道德伦理的堕落和沦丧。事实上,正如孟繁华所指出的那样,对性“这一日常生活现象已不再讳莫如深的今日中国,对它的了解和认识理应是健康和平静,然而,在道德化仍然具有支配力的当下,‘性’似乎仍然是个不详之物,对其漠然置之的掩饰仍是正人君子的惯用伎俩。”^②对性行为的性别歧视心理在1990年代无疑已是蒙昧不开的思想和文化的象征。

最后,认为女性对“性”的书写是自我裸露、是为了取悦于男人,这种观点非常流行。对此陈思和说过,“曾经有人批评说,为什么男性批评家热衷于女性作家自我隐秘经验,我对此类问题无以言答,只是将问题反过来想,女性的隐秘经验如果不是女作家来写,专由男性作家来代言,是否就正常呢?专来讨论女性隐秘经验该是由男性作家(如曹雪芹、D. H. 劳伦斯等)来代言,还是应该由女性作家自己来发现并且描写?我想这个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与此相关的男性与女性之间谁可能更加明确地描写出女性经验?我想这个答案也是不言而喻的。在文学史上司空见惯由男性自己作为女性代言人来表现女性经验的时代里,女性作家能否夺回这个领域里的发言权,我以为至少是女性文学成熟的标志之一。”^③

戴锦华对此也曾尖锐地指出:“一个先在设定的男性的观看、甚至是窥视的视阈,将女性反抗的姿态与不轨之举钉死在一个暴露/取悦的位置上。于是,僵死的、伪善的卫道嘴脸与热情、欢悦的误导之声,形成了又一处男性对立者间的合谋,一次针对女性文化突围的‘铁壁合围’。”^④

1990年代的商业运作和包装更恶化了女性写作的这一困境。“因为与批

① 陈厚诚、王宁主编:《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53页。

② 孟繁华:《女性的故事——林白的女性小说写作》,《作家》1997年第3期,第78页。

③ 陈思和:《林白论》,《作家》1998年第5期,第107页。

④ 戴锦华:《奇遇与突围——九十年代的女性文化与女性写作》,《世纪之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导言,第5页。

评家们的研究态度相比,只管‘炒上一把’的新闻媒体批评的确是不认真的和不负责任的。他们并不关心对作品文学价值的发现,而只是关心它的新闻轰动效应。”^①戴锦华在肯定了“女性对个人生活经验的直接书写,可能构成对男权社会的权威话语、男性规范和男性渴望的女性形象的颠覆”^②的同时也指出:“一个十分引人瞩目的危险在于,女性大胆的自传性写作,同时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所包装、改写。”^③“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商业包装和男性为满足自己性心理、文化心理所做出的对女性写作的规范与界定,便成为一种有效的暗示,乃至明示,传递给女作家。如果没有充分的警惕和清醒的认识,女作家就可能在不自觉中将这种需求内在化。女性写作的繁荣,女性个人化写作的繁荣,就可能反而成为女性失陷于男权文化的陷阱。”^④

世纪之交,所谓“美女文学”现象和木子美们的出现无疑就是这种商业运作的结果。商业炒作一方面制造了文学的泡沫现象,同时也忽视了文学自身的真正价值。但是如果因为商业包装而产生的负面影响,就对整个1990年代的女性文学创作产生质疑和否定无疑是不公正的。

事实上,“女人、优秀的女作家并不是为了被看而写作,她们为自己、为自己的性别而写作。”^⑤林白说过:“作为一名女性写作者,在主流叙事的覆盖下还有男性叙事的覆盖(这二者有时候是重叠的),这二重的覆盖轻易就能淹没个人。我所竭力与之对抗的,就是这种覆盖和淹没。淹没中的人丧失着主体,残缺的局限处处可见。”^⑥陈染说:“十余年来,我在中国文学主流之外的边缘小道上吃力行走,孤独是自然而然的。应该说,我不算是一

① 张福贵、黄也平、李新宇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审判》,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339页。

② 王干、戴锦华:《女性文学与个人化写作》,《大家》1996年第1期,第197页。

③ 同上,第200页。

④ 同上,第200-201页。

⑤ 同上,第199页。

⑥ 林白:《记忆与个人化写作》,《作家》1997年第7期,第14页。

个更多地为时代的脉搏和场景的变更所纷扰、所侵蚀的作家类型。我努力使自己沉静，保持着内省的姿势，思悟作为一个个人自身的价值，寻找着人类精神的家园。”^①徐坤也曾说：“我希望在我写作的每一个个体化的情感故事背后，都能发掘出人类内心里最本质的东西，因为那才是人的真实所在。”“作家的使命，他最能够简单平易达到的使命就是在人类心灵与心灵之间搭筑起一座桥梁，以助人们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②徐小斌说：“写作是置身于地狱却梦寐以求着天国的一种行当”，“它是人类进行着分割天空式的美好想象和对于现实世界的弃绝。”^③等等。

女性写作的态度无疑是明朗的。但是如果我们还深陷于性别歧视的误区，对女性文学采取不屑、或有意无意地进行误读、歪曲致使女性文学创作思想得不到及时的研究和阐释，那么这一代人无疑将在后人的眼里成为愚昧地走入性别误区的一群；如果不将蕴含于其中的丰富思想阐释出来，不仅是人文精神的一大损失，客观上也将阻止人类文明前行的脚步。

所以，本论文试图穿透一层层的商业迷雾和道德的攻击，抛开人性的歧视，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和理念，深入1990年代女性文学的创作文本，通过细致的研究和解读，透视女性文学所蕴含的真正价值；拨开众说纷纭，在人的价值立场上，去阐释其所具有的精神和品格；在现代性和多元化的人文语境中探讨其文化选择和价值取向；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探讨其精神困境与挣扎；在自我拯救与超越中审视其困惑与局限；在人的解放与女性的解放中反思其失陷与失落，等等。通过这些研究和阐释以期能使我们能清楚地认识到在特定历史环境与诸多文化语境下的1990年代女性写作对于人类历史与未来的价值和意义。

① 陈染：《我的道路是一条绳索》，见林建法、傅任选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版，第289页。

② 徐坤：《自述》，《小说评论》2005第1期，第32页。

③ 徐小斌：《逃离意识与我的创作》，《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6期，第45页。